

二十世纪外国教育名著译丛

所有儿童 都要学习

DOU YAO XUE XI
SUO YOU ER TONG



JIAO YU

安徽教育出版社

《二十世纪外国教育名著译丛》总序

程方平

我国是一个有悠久教育传统的文明古国，有许多宝贵的教育遗产和伟大的教育家，这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财富，也是我们的包袱。过去我们走在世界的前列，但进入二十世纪，我们逐渐落后了。我们的前人，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陈独秀、蔡元培、鲁迅、胡适、陶行知、杨贤江、黄炎培等努力向西方寻求教育的新路，引进、改造和实践了各种先进的教育理论，为我国教育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今天，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教育事业的发展再次对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表示了极大的需求。

首先，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在过去几十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且还常被引入歧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科学的对待。为了发展和进步，必须丢掉包袱，放眼世界，缩小我们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其次，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国家间、地区间的交往会日益密切，为了在这些文教交往中提高我国学者与先进国家学者对话的层次，翻译和出版国外教育名著已成为当前的迫切需求。第三，二十世纪是个“分析的时代”，（英国当代哲学家莫尔顿·怀特语）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科学方面的著名学者。人们把教育看成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和所有资源中最大的资源。（见英国人E·F·舒马赫著《小的

是美好的》一书)并把它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日本以教育立国,美国把教育看成是国防之外“最大的一项事业”,(见霍伯特·乌·伯恩斯的《教育基础知识丛书介绍》)苏联持续不断地进行教育改革,英国冲破传统正规教育的束缚首创“开放大学”,法国则最早提出“终身教育”的理论问题。所有这些重要的教育实践和改革,都有相应的教育理论为依据,并不断修正和创造出新的理论。这些理论包含了世界教育的发展脉络和思想精萃,是我们必须借鉴的。第四,由于我们和许多先进国家的教育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某些国家目前的实践及其存在的问题,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碰到。如教育观念的转变、教育的评价与视导,职业与升学指导,边远和落后地区教育的发展,教育与人口的增长,教育与国家发展等等。在这些方面,国外的科研与调查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对策和制定计划的重要借鉴。第五,对于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和教师来说,通过学习和研究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可以改变其传统观念,为其提供先进的教育思想、方法和技术等,提高教育队伍的素质。我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者的缺限之一就是不能从多视角和多层次来分析和观察教育问题,陷入传统的教育中不能自拔,并且还缺乏对自身问题的认识,特别没有危机感。过去有不少教育家和学者注意引进国外的先进理论来冲击我国陈旧的教育体系和教育观,现在这种需要更强烈了。

编译《二十世纪外国教育名著译丛》,我们是经过长期的缜密的考虑的。在老一辈教育家的支持、鼓励和帮助下,我们逐渐学会如何来看待世界、分析世界,如何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也有了组织编译这部《译丛》的信心。近些年来翻译引进的国外著作不少,而且的确在社会上产生不小的影响,教育思

想界也渐渐地活跃起来。但是，我们也看到，由于过去我们引进、介绍得太少，国内学者获取国外图书又不很方便，所以著作的翻译有时带有相当的偶然性和盲目性。即便是有影响的好书，也因为缺少必要的参照和对应的研究，而出现一哄而起的现象。有的人将其奉若神明，有的人则钻进去出不来，使自己的思想蔽于一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引入时，对我国的思想理论界产生很大震动，教育理论界也趋之若鹜，耗费了大量研究力量。人们只知有三论，而不知有三新论：现代化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理论及其他。又如，布鲁纳的《教育过程》翻译出版后，在我国教育理论界出现了研究热，甚至到了言必称布鲁纳的地步。对此，一些国外学者感到莫名其妙，他们视为一家之言的学说在我国居然成为统治一时的思潮。为了避免这种偏向的出现，编译丛书是个好方法。美国的约翰·威利父子公司曾在1963年出版了格弗·克内勒主编的“《教育基础知识丛书》”，此后纽约的哈珀与劳出版公司，英国伦敦的罗特利奇与基根-保罗出版公司等，在欧美不少国家都相继出版了许多教育理论丛书，涉及到教育原理，教育中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教育、教育的传统与变革、教育与国家发展、教育的问题与危机、教育概念、教育评估等等，极大地丰富了教育思想，开扩了人们的视野。丛书的优势在于，它能满足多方面的理论需求，为当今和未来的教育工作者提供充实的资料。在我国，近年来出现了不少“译丛，”但集中反映二十世纪国外教育理论方面的还没有，我们组织编译的这套《译丛》是一个尝试，也为了适应社会这一需求。

当然，先进理论的引进和传播并不是我们的目的，了解西

方也并不是要全盘西化或资本主义化。我们的目的是振兴和发展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提高我们的教育质量和水平。在这一点上不仅我们应有正确的认识，国外许多学者也都提出过相同的看法。瑞典学者英格玛·法格林德与澳大利亚学者劳伦斯·杰·萨哈在其合著的《教育与国家发展》一书中就特别提到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理论的研究是必要的，但要避免因理论著作的杂乱无绪和理论家各执一说带来的困惑和局限，要立足于建立合乎自身发展规律的教育理论，要因时因地制宜。我们相信经过这些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锻炼，我们绝大多数教育工作者已初步掌握了学习和研究国外理论的正确方法，盲目排外和盲目崇洋都是为人们所抛弃的做法，人们开始学会分析、比较和思考。

应该指出《译丛》的包容量是有限的，只能在一定数量上和一定范围内提供借鉴，形成比较，不可能面面俱到。其主要原因是出版数量的限制，也因为避免与已出版的各种教育名著重复。至于译校的水平，请广大的专家、学者及读者多多赐教和批评。

在编译过程中，得到了北京教育与科学普及研究所、中国科技人才交流中心大力协助，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布卢姆与教学改革(代序)

刘佛年

布卢姆教授是美国有名的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是芝加哥大学的名誉教授和西北大学教授。根据国家教委与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商定，他最近应邀来我国，对教育工作者作了多次学术报告。

布卢姆在教育科研方面有许多重要的成就，写了十七部专著和大量论文。

布卢姆是一位教育改革家，他的理论研究和他的改革实践密切结合的

确切地说，他是一位教育改革家。他改革了芝加哥大学的考试(评价)制度，使考试改革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杠杆。他多年进行“掌握学习”的试验，目的是要提高大多数学生的学习质量，解决我们称之为“大面积丰收”的问题。他的一些理论研究是和他的改革实践密切结合的。

布卢姆在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以后，从四十年代起就参加了该校考试委员会的工作，以后又担任了考试长。这个考试委员会成立于三十年代初，最初的工作是把出题、阅卷的工作从教师手里拿过来，改革主观

任意性很强的考试方法，使考试客观化、科学化。但考试的内容还是一些教科书内的知识。进入四十年代以后，美国的教育思想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不少教育家不再片面重视呆背硬记的书本知识，而更重视发展运用知识来解决问题的能力。芝加哥大学也开始进行教学改革。布卢姆等抓了考试改革这一环节。因为考试终归是指挥棒。考试方法改了，教学方法才会改变。经过改革，考题不再是照抄教科书就可以回答的，而往往是教科书内没有的新问题，要通过学生的思考才能解决的。有些考试甚至采取“开卷考试”的方式，允许学生带大量的书籍和其他资料进考场。每门学科的六小时考试，三分之二是超出书本的试题。这样一来，教学方法就不能不作相应的改变。传统的大课堂讲授没有了，通常的是二三十人的小课堂，师生可以在那里进行相互讨论。许多教师不再规定教科书了，而是指定学生看原始资料和其他现实材料。这样改革数年后，就有了显著的效果。过去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做商业界领导工作的不少，但很少有搞科学研究的人物，而十年之后这样的科研人才增加到占毕业生中的百分之二十。这些年来，芝加哥大学出现了七十多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不是偶然的。

无论是考试改革或教学改革，重要的是确定教学目标。评价的作用就在于了解学生实现了目标要求的程度。布卢姆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和同事拉尔夫·泰勒是研究课程和评价的有名学者，他非常重视教学目标，认为课程、教学、评价都离不开目标的制订。布卢姆在改革评价的过程中完成了这个任务。他在一九五六年出版

的《教育目标分类学·认知领域》是这方面的第一本影响极大的著作。刚出版时，人们并不注意。但不久，美国的教材改革的高潮到来，一下子它成了热门书，行销了一百万册，教师们几乎人手一册，译成别国文字，大概又行销了一百万册。直到现在，凡是制订教学目标的人还是不能不参考它。我们平时所说的知识、能力、创造性等都包括在目标中。在认知的标准中，属于较低级的思维过程的有书本知识的识记和领会；属于较高级的思维过程的有运用原则、概括来解决“新”问题、分析“新”情境的能力；属于更高级的思维过程的则有属于创造性思维的“综合”和评价。每一阶层还有更细的区分。此外还有感情的标准、心理运动技能标准。有些人不同意他的分类，后来陆续出现了很多种分类的标准。也有些人可能不同意他用的术语。他坚持自己的分类，但并不否定其他的分类。我们的教师如果要具体、深入地了解他的目标分类，恐怕还需要有人详细介绍两三种他的这方面的著作。特别是一九七一年出版的《学生学习的形成性和终结性评价手册》一书，其中有各学科的教学目标与评价的范例，可供教育工作者参考。

布卢姆是“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的创建者之一，这个机构对推动各国教学改革起了作用

在一九五九年，他和瑞典的学者托尔斯敦、胡森等人创建了“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IEA)。在以后的二十余年中对二十多个国家的中小学的某些学科成绩进行了测验，并联系社会、政治、经济、教学等因素进行

分析和比较研究，对推动各国的教学改革起了不小的作用。现在我国也已参加了这个国际性的评价活动。这个评价活动的做法大致都是依据布卢姆的理论。在同一年，布卢姆应邀到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他开始了关于人类特性的发展和差异的研究。他运用了上千种关于人类从出生到成熟期各特性发展的测量、调查材料，作了细致的统计分析。一九六四年出版了一本名著《人类特性的稳定与变化》。一九七六年又出版了《人类特性与学校学习》。它涉及身体、智力、成绩、兴趣、情感、人格的特性，以及许多特性的发展和差异与遗传、环境、教育影响的关系。他发现各种特性常有一个发展相当快的时期，这个时期一般在幼年、少年期，过了这个时期发展就慢了、困难了。所以在这种关键时期施以有利的环境、教育影响，特别能促进这些特性的发展。我们很自然地就会从这种事实得出一个结论，即学前的、小学低年级的教育是最重要的。他还发现现象学业成绩这样的特性常常会出现很大的差异，例如由于家庭或幼儿园的影响，一个小学一年级学生的识字量可能比另一个多六倍。而且这种成绩的差异愈到高年级就愈大。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因为学习有一种“序列性”。每学习一门新的学科或单元，都有一些必须具备的知识、技能、能力、态度等作为基础。有些学生没有学好前面的学科或单元，后面的当然就学不好。一年一年下去，缺乏的基础越多，他的成绩就越落后。所以一般在学校里总有一批成绩很差的学生，一批成绩勉强及格的学生，优秀的学生往往不是很

多。

布卢姆认为现代社会的教育不能只面对少数学生，应该让绝大部分学生都能学好

这种情况当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布卢姆认为现代社会的教育不能只面对少数学生，应该让绝大部分的学生都能学好，于是他积极从事教学改革的实验。他首先抓住打好基础、循序渐进的问题。他的“掌握学习”通过他的一百几十名来自各国的博士研究生正在许多国家实验。接受实验的在全世界有五千多万学生。近两年来在我国也已开始受到注意。所谓“掌握学习”，简单地说，就是教学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我们所要求他们学会的东西。它的方法是首先教师要制订这门学科及其每个单元的教学目标，如学习哪些内容，发展哪些能力。在每一个单元学完时，对学生的学进行一次评价。布卢姆认为评价有三种：一是终结性评价，是在学科结束时进行的；一是形成性评价，是在一个单元或一个阶段结束时进行的；一是诊断性评价，往往是为了诊断学生学习某学科时是否缺乏某些基础。在一个单元完毕时进行的形成性测验是根据这个单元的教学目标来拟订测验题的。测验下来，就知道哪些学生是“掌握”了要学的东西，哪些学生在哪些问题上还没有学好。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反馈”。教师于是发动学生小组相互帮助、矫正某些学生的缺点，或者教他们自己去看教科书的某些部分。有些问题也许需要教师自己把某些内容用一种新的方式向这些学生再补授一次。然后再进行一次平行性

测验。这样才可以开始进行下一单元的教学。所以“掌握学习”的核心是“反馈与矫正”。这个方法的好处是每单元坚持这样做，学生缺的基础会愈来愈少，学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学习的信心会愈来愈足。经过十五年以上的努力，布卢姆和弟子们的实验成绩是巨大的，但我不准备在这里多谈了，需要有人专题介绍。简单说一句就是。在期末考试时，实验班的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学生可以达到控制班中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最好学生能达到的成绩水平(原来两班成绩基本相同)。如果在新学科学习开始时进行一次诊断性测验，并用几节课时间向基础有缺陷的学生进行补授，成绩就会更好。

近几年来，布卢姆教授和他的一些博士研究生在进行一系列实验，企图把学生的成绩提到比“掌握学习”班的成绩更高。他们的目标是要使新的实验班的百分之九十的学生达到“掌握学习”实验班只有百分之七十的学生能达到的水平。在新的实验班中往往继续使用“掌握学习”，并加上其他一两种因素，如对学生加强鼓励，改进教师的提示与解释，让更多学生参与教学活动，改进阅读和学习技能，加强学习互助小组，改进家庭教育等。他们采用的这些方法有十几种之多，有些和我们的某些先进的改革者所用的很相似。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些方法只能使学生达到教学目标分类中的较低级的思维范畴，而现在他们注意的是如何改进较高层次心理过程的教学。

教育者只有掌握了各类英才发展的模式，提供各种必需条件，再加上年轻人艰苦的努力，才能培养出真正的英才

布卢姆不只是重视大面积丰收的问题，也注意第一流英才的培养问题：在八十年代的前几年，他组织几位弟子和他一起调查了按国际标准属于第一流的二十五位英才的成长过程，其中有钢琴家、雕塑家、数学家、神经生理学家。他把调查的结果编成一部著作，于一九八五年出版。书名是《发展青少年的才能》。布卢姆并不否定天赋素质的重要性，但是为什么年幼时表现了差不多同样素质的人，后来只有少数成为第一流的人才，而多数则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峰呢？根据调查材料，明显地看出这和家庭、学校、社会的环境与教育有极大的关系。只就教师这个因素来说，培养出第一流的钢琴家要经过三个阶段：幼年的阶段中需要一位教师，他会使学生在弹钢琴时觉得是在做有趣的游戏，不断地鼓励学生；第二阶段需要有一位严格的教师，他要求学生长时间地一丝不苟地反复练习；第三阶段中要有一位可以称为大师的教师，他要求弟子不仅发展完美的弹奏才能，还要有自己的风格。象这样的一些教师，特别是大师或名师，在一个国家内是不会太多的。教育者只有掌握了各类英才发展的模式，又能提供各种必需的条件，再加上年轻人自己多年异常艰苦的努力，才能培养出真正的英才。到现在为止，每个社会发展英才的潜力是极其巨大的，而实际培养出来的英才却是极少的。布卢姆认为每个社

会能够大大增加它所发展的才能的数量和种类。

从杰出人才成长的调查中,可以看到技能的重要性。钢琴家必须做到弹琴技能的自动化。弹琴的动作自动化了,才能让脑子用在对整个乐曲的体会上。在普通人的教育中也是如此。例如阅读的技能自动化了,人们才能迅速地阅读,而同时又能集中心思掌握全文的意义。所以贬低培养熟练的基本技能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我赞同布卢姆的某些理论性的结论:例如说人在学习上的潜力是极大的,只要教育得法,几乎每个人都能很好地掌握中小学的课程等等。但是我认为在具体的方法上,我们必须既参考国内外的各种经验,又密切结合国内的、本地的、本校的实际。

致 谢

承蒙最初刊登这些文章的刊物与著作的编辑、出版者同意，作者得以免费把这些文章收入本书，对此深表谢意。

《教育中的无知》，原载《学校评论》第80期(1972年)332—352页。经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同意。

《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的研究对课程和教学的影响》原载《学校评论》第82期(1974年)，413—435页。经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同意。

《教育研究二十五年》，原载《美国教育研究杂志》第3期(1966年)211—221页。经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同意。

《家庭里的早期学习》，佩利讲演会，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1965年)，经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同意。

《人类特性的稳定与变化：对学校改革的意义》，原载《教育管理季刊》第2期(1966年)35—49页。经编者同意。

《新的学生观：对教学与课程的影响》，原载《教育领导》第35期(1978年)563—576页。经编者同意。

《为掌握而学》，原载《评价论坛》1968年5月第一卷第二期。经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评价研究中心同意。

《教育科学在课程编制中的作用》，原载《国际教育科学杂志》第一期(1965年)5—15页。经珀格蒙出版社同意。

《高峰学习体验》原载M·普鲁弗斯编《教学时的创新》，华盛顿、全国教育协会(1966年)。经全国教育协会同意。

《评价方法的变化》，原载R·格拉泽编《研究·发展与

学校变化》，希尔斯戴勒，新泽西。劳伦斯、埃尔鲍姆协作出版社(1978年)。经编者与出版社同意。

《有关教育评价的一些理论问题》，原载R·泰勒编《教育评价》，全国教育研究协会第68期年鉴，第二部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9年)。经全国教育研究协会的编者同意。

《芝加哥大学考试观念的变化》，原载P·德雷塞尔编《普通教育中的评价》，布朗出版公司(1954年秋)。经编者同意。

(王 钢 译)

总 论

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的新方向

阅读这些文章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即在教育研究及在了解直接影响学习的某些因素方面，是什么导致了这场世界性的革命。这一研究所获得的新观点能大大改善学生的学习，而且还能描述出一个实际上能促使所有学生学习达到高水平的适当的学习环境。

这些新观点已经在全世界的许多课堂里成功地运用了。地方学校能否迅速进行尝试将取决于这些学校的领导，取决于公众对改进学校学习的要求，取决于教育院校在培训教师方面所能起的作用。在一些国家里，课程发展中心承担了把新的研究应用于学校的领导工作，它们把这些新观点渗入到新课程教学过程所需的新教材以及教师培训中去。

有一些特点可以说明这些新的研究发展的惊人之处。简单地说，我们从研究教师和学生特点转变为对课堂里师生之间相互影响的学习进行直接观察。换一种最直接的说法便是，从对行为者（教师和学生）的研究变为对课堂的教和学的研究。现在教育研究人员正日益在课堂环境中进行研究，研究特定的教

一学过程及其在学生和教师身上引起的变化。这些研究关心的中心问题是这些潜在的进展及学生学习的质与量变化之间的因果联系。

然而，最重要的变化也许是那些在教一学过程发生前或作为教学过程一部分的，我称之为固定或静止的变量转变为可改变的变量这一变化。我认为，正是这些变量的转变才构成了教育新观点的中心内容。这种改变使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从重视预测和学生的分等转为关注教与学中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因果及联系。这一关注导致产生理解、阐明和改变人类学习的一些新方法。寻找可改变的变量及其得以改变的原因，只是在教育研究中新近才采取的一个步骤；但我相信在今后十年里，这将成为教育研究和实践的一个重要部分。

如果家长、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真正确信，一种好的教育对所有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是绝对必须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共同去寻找，在校内外能够使儿童和青年的学习产生差异的可改变的变量及过程。这种可改变的变量将大大有助于说明学习过程，并对直接改进学校的教一学过程起到巨大的作用。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深入了解如何才能改变这些过程，它们对学生、教师和学习又会产生什么效果。

这里以及本书的文章中所描述的少量可改变的变量，只是些经过研究人员的研究并已被教师采用了的变量。对这些变量的研究已使我们对学校学习的认识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而最重要的是，这些变量使我们对学习者及其惊人的学习潜力的看法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希望在今后十年里，这一小小的清单将会迅速扩大，而且这些变量将成为教师、家长和研究人员共同关注的中心。一旦这些变量被充分掌握并得到正确运用，